

青年作家应更多关注参与报告文学创作

——鲁迅文学院举办报告文学专题研讨

6月30日,“责任与担当——当代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的追求专题研讨会”在鲁迅文学院举行,此次活动由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发起、组织并得到了院方的大力支持。这是一场针对当前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的写作现状,探讨与剖析当代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的责任与担当意识,呼吁更多的青年作家关注时代、关注民生,参与报告文学写作,共同推动报告文学发展的研讨会。

在研讨发言中,与会的专家学者以及高研班学员从多个方面畅谈了自己关于报告文学的认识。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针对当前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现状,简要谈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他说,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当今的中国,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这也体现了报告文学的属性。其次,我们要关注对文本的要求。文学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艺术的要求,为什么报告文学作品会受到一些攻击、一些非议,就是因为作品虽然新闻性够了,但文学性、艺术性还不够。第三,上百年来,报告文学一直不断地发生变化,面对新闻阅读、新文体等现代因素的冲击,必须不断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这也关系到报告文学的未来发展。第四,要辩证看待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和歌颂性。对于报告文学来说,批判性和歌颂性是分不开的。最后,报告文学担当着社会责任,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报告文学作家承担着知识分子的责任,特别是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要不断增强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目前,参与报告文学创作的青年作家还不多,希望更多的青年作家参与到报告文学创作中来,努力写出更好、更精致、更伟大、更经典的作品。

如何看待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是与与会者较多谈及的方面。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从报告文学的思想性方面进行了阐释。他说,现在很多人总是以文学性表达不够来批评报告文学,甚至贬低报告文学。这种看法自有道理,报告文学的确需要文学的感染力。但我们要看到,真正好的报告文学作品并不完全是以文学性取胜的,它的思想性尤为珍贵。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如果包含着作者对社会和事件独特的看法、深刻的认识,那就是力量,这种力量远远超过文学性所带来的力度。我们不能忽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但也不能老以文学性去侵占报告文学的思想性。

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什么?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鸣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认为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格的独立。作家要对事物有自己独立的观察和思考,能作出准确的判断,而不会受到某些概念的影响。报告



文学作家和新闻记者的区别在哪里?新闻记者是要在现场报道,要在第一时间内把最有价值的信息传达出去,报告文学作家是要在这些新闻事件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独立思考,最终传递和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所以,在所有的社会问题上,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建立起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最终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表达与众不同的思考。

与会其他专家谈到,要打破关于报告文学的陈旧观念。只要是纪实的、文学的,有新闻性的内容和信息,都可归到报告文学范畴。要打破认为报告文学作家是“单面手”认识的成见。在网络和媒体时代,在海量的信息面前,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有一种责任感和紧迫感,自觉担当起“时代轻骑兵”的责任,以作家独特的文学性和思想性,重新打开那些

在时效性上属于第二落点的新闻事件,并以其思想性的光芒照亮新闻背后的真相,揭示其启迪人心的意义。报告文学要突出目前的困局,一是要在发表阵地上再做拓展——不仅是纸媒,还要有电子网络;二是报告文学作家自身要在贴近时代和加强文学性、思想性上多下功夫。

高研班学员谢友义、周鸿、曹景常、王凤英、苏宁、彭文瑾、王永盛、丁晓平、魏建军、纪红建等从各自的创作和研究实践出发,畅谈了他们对报告文学创作的认识及困惑。他们认为,报告文学传承与影响意义深远。优秀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能以一种“正能量”的光与热去照亮人们,感召与激励人们前行。时代感强是报告文学作品的特点,那些有高度、有深度的报告文学能抵达人们心灵的最深处,通

过时代人物和时代事件,打下了特定时代精神的深刻烙印。报告文学是平凡生活精彩瞬间的记录,不是表扬,也不是批评,而是真实地记录。写一个人,需要关注其心灵曾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我们身边的人大多是平凡的人,这些平凡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做的一些司空见惯的事,却能让我们深深的感动。

还有的学员从各自专业出发对报告文学创作提出了建议。他们认为,报告文学作品要想抓住读者,就必须更新观点,改变写作方式,要在极短的篇幅内将传递的信息量做到最大化;同时在写作手法上也可以向网络小说学习。来自部队的学员谈到,有价值的热点聚焦和重大事件的开放幅度,均使军旅报告文学作家具有身份上的优越性。这些先天优势如果有深入细致的采访、深入思索的潜水作业和浓郁的个人情感的加盟,就会诞生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

也有人谈到了报告文学在当下面对的困境,他们意识到,当前很多青年作家,对这报告文学一文体有不正确、甚至是片面的认识,认为报告文学作品走向经典文学作品的路径比其他文体狭窄。作为一种时代性极强的问题,如何在作品中对时代精神进行多方面、多样性的叙事探索,需要解决的问题。

究竟该如何促进报告文学的繁荣发展?学员们提出,一是要实现报告文学责任与使命的完全回归。二是重新确立报告文学的批判属性。三是进行文本规范的自觉。与会者还谈到了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备的品质与素质。

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有独特的“气”和“度”,作家的肩膀要有硬度,作家的思想要有深度,作家的眼光要有锐度,作家的胸怀要有宽度,作家的手脚要有速度,作家的心灵要有强度。因此,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要培养责任心。责任产生力量,怎样才能逐渐培养这样的力量呢?作家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老“宅”在一个地方。世界那么宽阔,从事报告文学的题材写作优势那么独特,这些都可以由作家选择。

“接地气”是报告文学的一大特点,作家因此必须坚持用“脚步”写作,这是一名报告文学作家高度自觉参与的表现,更是勇气与毅力、道义与良知、责任与担当的充分表达。这是作家全身心的投入,是对内在激情的唤起,更是精神的行走。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成曾楸主持研讨会。他说,报告文学因其与现实生活的密切性,因其真诚性与批判性,在诸多文学样式中体现出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并在拉近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方面,在为时代鼓与呼、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方面具有强大的直击人心的力量。这就要求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用手中的笔去反映时代的进程与人民的意愿,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此外,报告文学还应该给读者以文学的享受、美的享受,起到陶冶情操、启迪心灵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报告文学发展到今天,呈现出新的面貌与状况,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学处境中,报告文学的发展面临哪些新的挑战?报告文学作家尤其是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要付出怎样的努力?这些问题都亟待梳理和探讨。

(陈涛王宽)

照亮乡村日常生活的隐秘纹理

□北乔

知女人年轻时做过“三陪”,他们心中有了某种异样,对女人由敬佩到远离。老人去世后,女人离开了凤庄,逃离了这个村庄的人们。

《回头客》与《陪夜的女人》同属一种叙事结构,这一次是一个男人闯入了蒲庄。蒲庄几乎与世隔绝,对外来逃荒要饭的人,蒲庄人表现出朴素的善良,不计回报地帮助他们。自己过得很清苦很节俭,但很大方地给难民吃喝,即使得知有些难民离开时偷走他们的食物和日常用品时,他们也很宽容,从未计较,也从未影响他们对后来的乞讨者进行无私真诚的施舍。但目睹这些乞讨者在村庄不远处肆意不劳而获地吃喝,蒲庄人认为受到了愚弄,从此不再让外来者进入村庄。一个男人来到蒲庄,不是乞讨,而是为了报恩,报答蒲庄人在他与妻子第一次流亡到蒲庄时得到的恩惠。

男人的身世很神秘,朱山坡相当狡黠,制造了一个个悬念。但男人的报恩是实实在在的,他要亲手为蒲庄的每户人家做一件家具。蒲庄人没想过乞讨者的报答,男人的举动让他们很意外,也觉得男人没有必要这样。男人决意要报恩,蒲庄人也就在不好意思中接受了。因为男人的闯入,厚道的蒲庄人的言谈举止中飞扬着算计、猜疑、不满和角斗。表面上,这是男人的错,没有他的闯入,蒲庄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子。可是,我们知道,这其实不是男人的错。如此一来,《回头客》真正的叙事目的和内在力量令我们惊讶。

朱山坡对父辈的人生和心灵情感世界,有着超乎寻常的迷恋、渴望追问和了解。是的,感知父辈,便能在一定层面上知晓我们的前世、今生和来世。这可能是朱山坡的书写意旨,至少也是主要目的。

《跟范宏大告别》中阙天津在将死之时要向村里所有人告别,尤其是要向范宏大告别。在寻找范宏大的路上,他向四个儿子讲述了他与范宏大的交往。在寻找范宏大的过程中,三个亲生儿子相继离开回村子了,只有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大儿子一直陪着他。血缘间的传承在此断裂,看来,他要告别的不是范宏大,而是与一个时代告别,一种伦理在他的告别中消亡。

朱山坡有不少的作品,叙述对象都是父亲或母亲,叙述者是儿子。看来朱山坡不愿随意猜测父辈的生活,只以旁观者身份进行有限度的呈现。有意味之处在于,朱山坡并没有走进父母曾经的生活现场去揭开那些我们无法参与又特别感兴趣的生活,也没有着力于时下父母紧紧裹着的内心空间,而是关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非常态。换句话说,他捕捉到父母在平常生活中的某个爆发点,支撑着叙事的驱动力。

《鸟失踪》中的父亲,在年老体弱之后变得面目全非。“晚年的父亲已经集天下男人所有的毛病于一身:酗酒、好赌、懒惰、几个月不洗澡和对老婆的傲慢,还不遮不掩地到陈村光顾一个40多岁的贵州妓女的被窝。更甚者,父亲要跟母亲离婚,异想天开地和贵州女人结婚。”父亲只有到“我”这儿,才会重现变成原本的父亲形象。后来,父亲喜欢上养鸟,养鸟的父亲安静老实下来了。最后母亲像鸟儿一样失踪了,只留下了一屋子各色各样的鸟。

小说的最后给父亲的出走留下了一个理由,他是到南方去寻找30年前战死的大儿子。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只是朱山坡的叙述陷阱,看似指引了一条解读父亲行为的信息,其实是在扰乱我们的视线,增加小

说的内涵。很明显,鸟是一种象征,父亲在鸟身上体会到了关在笼子里的感受和飞翔的自在。活了一辈子,快接近生命终点时,突然变得如此的反常,如此的不可思议,这让我们的思考难以穷尽。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特质,正是在此种叙事中旺盛。

《骑手的最后一站》中的父亲更是不可思议。父亲进城得势后与母亲离婚,娶了第二任妻子。后来他犯事入狱,第二任妻子抛弃了他。他出狱后得了肺癌,在临死之前,他回到母亲身边。没过多久,他让“我们”把他绑在马上,冲进了漫长而黑暗的隧道。父亲的形象是单薄的,行为有太多的省略。父亲为什么非要回到曾经的地方,然后又以这样的方式去死亡?是愧疚,还是重新从起点开始另一程的行走?一切都由人们独自去理解与想象。

相比之下,《败坏母亲声誉的人》中的母亲,倒有着清晰的面容。这部两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被朱山坡埋入了太多的东西,以致于难以简要地概括。我们的阅读动力源于哪些人又是如何败坏母亲声誉的。母亲年轻时喜欢一个戏班主,但未能如愿,后来村里的一些人以戏班主给母亲写的一封信为要挟,不停地向他借钱。这些人还谎称父亲在外面有了女人。母亲与戏班主之间其实很清白,村里人也没有拆开过那封信。父亲去世后,母亲嫁到了外地。但母亲的第二任丈夫倒是确实实败坏了母亲的声誉,让她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母亲对他厌恶痛恨到极点,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他。然而,他找来后,母亲内心的某种东西又被唤起,不但帮他洗衣服,最后还和他一起走了。母亲的人生乱如麻,朱山坡为我们提供的信息入口和出口是同样的混杂交错,可以牵出无数个线头。我们能确信的是,母亲内心很善良,还有些柔弱,其他的就取决于我们的阅读和意会了。

在我看来,朱山坡的叙事最出彩之处,是他那相似却又令人难以忘却的结尾。这结尾的姿势几乎是一样的,一个逃离了原先的生活与世界,走向了无法知道的前方。这结尾立起了一个人,一个细节像钉子一样深深镌进我们的心田。《陪夜的女人》中的女人划着船离开凤庄,“跑得飞快,像鬼船一样”;《回头客》中的男人与船一同下沉消失在湖中央;《灵魂课》中的那位母亲拄着拐杖却走得很快,最终她打拐杖上高高悬着的气球消失在马路拐弯;《跟范宏大告别》中的范宏大“几乎是拖着右腿跑的,但跑得很快”。《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中的男人“尽管他的左腿有些瘸,但他走得很快,一会儿便随抬担架的人连同担架上的男尸一起消失在小巷尽头”。

逃离,或是因恐惧而挣脱;或是因不满而寻找新的可能;或是因绝望而毁灭。这些人的肉身在我们的视野中遁去,可他们的形象和姿势永远驻留在我们心中。我们能做的是眺望他们的背景后再次回到他们逃跑前的生活,去发现,去思索。

解读朱山坡的小说是件相当困难的事,但阅读起来可以十分畅快,趣味无处不在。他没有精心地编织故事,但每部小说都有趣意十足的故事故。这些故事发生在乡村,有着鲜明的地域性乡村风味,但又能让我们在阅读中不自觉地忘记乡村的存在,走入普遍性的生活境地。他的叙述是那样的诚实,像河水一样自然流动,但漩涡无处不在,你觉得行走顺畅,其实早已被拽入了迷宫。与博尔赫斯的迷宫稍有不同的是,朱山坡的用意不是要让我们迷失,而是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通道和出口,赋予作品多层次多方向的叙事风景。

黄金明的中篇小说《实验室》(刊发于《芙蓉》2012年第5期),是其“地下人”系列小说之一。读这篇小说,一开始我是云里雾里的,似乎作者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完全不在传统小说叙事的时空框架之中。细读之下,才最后明白,这又是一部梦幻小说,不但故事的现实时间被取消了,而且故事发生的空间也模糊了虚实边界。虽然对于读者来说,这样的叙事结构有些难以接受,不过倒也与题目极为妥合。你想想,实验室的时间与空间不是具有虚拟和现实的双重属性吗?当我们身处于实验室之中,一方面我们所拥有的时空属性是非现实的;另一方面,实验者是来自现实世界之中的人,他赋予了实验室一种现实的目的和意义。黄金明笔下的“实验室”,存在于梦境之中,是一个完全超现实的世界。但这个梦,无非是现实世界的一个意义倒影。小说中有一句话,在我看来,是值得一品的:“我只有在梦境中才能摸到现实的衣角”。

故事发生于2066年。由于人类对地球空间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地上城的居民们已经久违了辽阔而清澈的天空。与此同时,地上城远远满足不了城市人口的膨胀,地下卫星城被大规模开发出来,成为收容地上城多余人口的一个个巨大的幽暗空间。就在地下城之一的洞城里,科普作家陆深做了一个长达16天的科幻之梦。在梦中,他以诗人的身份受邀参加“天空与信仰暨重建天空高峰论坛”。论坛的主办单位是致力于开发人造星球的新宇有限公司。诗人陆深接受了公司主管黄晶的邀请,参加一个外表只有核桃一样大小的人造星球的实验计划。至此,“实验室”在这个小说中的具体所指已很明确,它就是人造星球。诗人陆深进入这个实验室,见到久违的天空,与美丽的黄晶姑娘开始了一段奇异的创世之旅。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梦,当陆深醒来,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巨大的、密不透风的圆茧里。这个圆茧在小说结尾处出现,多少显得突兀,却不失为一个精彩的寓言,它是对人类一切作茧自缚行为的微妙嘲讽。

读完这篇小说,我首先想到了张雨生的一首歌。这一段歌词,相信人人皆知:“走,带我走,走出空气污染的地球。”后来,张雨生果真很早就到这个世界告别了。万物在他生命中已归于沉寂,而那个空气污染的地球还在继续着它的滚滚红尘。与张雨生的“一骑绝尘”稍有不同的是,黄金明对“重建天空”的幻灭式书写,显然包含了他对现代文明爱恨交加的态度,但从根本来讲,他表示了深深的失望。于是,重建另一个世界的终极意义回到了小说本

走出空气污染的地球

□曾念长

身。人造天空只不过是一个梦,惟有小说本身让这个梦定格为一个真实可靠的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就是小说家再造出来的,它与现实世界保持着距离又遥相呼应。

这是一次发生于城市毁灭之后的“科技乌托邦”书写,由此我想到了1858年,别林斯基在给托尔斯泰的一封信中有这么一句话:“街上也有泥土和灰尘,然而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没有城镇。”写这封信的背景是,当时托尔斯泰正准备创办一本纯艺术杂志,他邀请别林斯基成为这本杂志队伍中的一员,但别林斯基谢绝了。此时的别林斯基已从早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信仰中走出来,宣称“在我们这样糟糕的时代,艺术必须是奴仆,服务于其自身以外的目的”。借用别林斯基与托尔斯泰这个问题回到了文学本身的问题。别林斯基的意思是,文学不必去蒙受街上的泥土与尘埃的污染,但作家却必须为保卫自己的城镇而行动。这就是文学的“双重伦理”,一个是面向自己的,一个是面向社会的。

黄金明的这篇小说,自觉或不自觉地触及了“文学本身”的叙事伦理问题。作者有着敏感的现实关怀意识,对不断膨胀的城市文明所具有的“正能量”持一种深切怀疑的态度。正是从这个态度出发,作家启动了想象的程序,在这“另一个世界”中,作家同时完成了对自我形象的确认,他可能是一个热爱自由的诗人,也可能是一位“毕生都在地底下疯狂劳作而徒劳无功”的艺术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把黄金明的这个作品看成是一篇具有“元小说”质素的小说。它清晰地指向了“文学本身”的问题,也就是“文学何为”的问题。尽管这或许不是作者的“有意而为之”,但无论如何,在作者的观念世界中已具备了思考这些问题的基本雏形。

黄金明的语言兼具哲学家和诗人的双重品质,一方面充满了雄辩和辩论,另一面则是加速度般的跳跃与张力。这里显然包含了作者的那种写作抱负。但是,在实现这种抱负的过程中,对自身的内部复杂要素的清理与重建,却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黄金明似乎还没有最终完成这一任务。他的语言,大抵上被一种混杂的气息所笼罩,其中亦不乏有诸如“才子佳人趣味”等的自然流露,这多少让我感到有些困惑。毫无疑问,作家投射在作品中的观念世界一定是复杂而多义的,但这并不妨碍他通过自己的语言实现自我净化。只有完成这种净化,作家的面孔才可能变得更加清晰,才有可能在读者中找到自己的知音。写至此,我意识到我并不仅仅是在对黄金明的小说发表看法,更包含着对自己写作的反省。